

“四大摇篮”彰显江西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 鲍泽敏

人们常说，江西是一片红土地，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土壤中含铁的成分比较多。还有一种形象的解释就是，江西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25万多人。

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共和国的摇篮瑞金、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西红土地上辟新途、写新篇、创奇功、建伟业，架构了治国理政的文韬武略。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当时江西的革命形势尽管转入低潮，但革命复兴的新希望依然火热。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为反抗国民党镇压，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西举行南昌起义，开启探索和开辟革命新路的艰难征程。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等从武汉到达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的一部分军队，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23日，恽代英和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就南昌起义的计划探问贺龙意见，贺龙表示赞同。24日，李立三等在九江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叶挺、贺龙率领的革命军队于7月28日以前在南昌集中，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4日至25日，周恩来等在武汉举行会议，同意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计划，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前委书记，赴南昌组织和领导起义。27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抵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正式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部队共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起义胜利后，及时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开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宁冈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会议认为井冈山是理想的落脚场所，决定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两支地方武装。10月27日，部队进驻茨坪，完成了向井冈山的历史性进军。11月初，毛泽东率部队回到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后，不断取得武装

斗争的新胜利。1927年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2月21日，在耒市召开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宁冈成为工农革命军的军事大本营。随着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割据区域的巩固、党组织的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1928年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随后，各县党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至6月，莲花、酃县都有了县委，各县共有1万多名党员。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井冈山的红色区域迅速扩大，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统一领导各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迎来了全盛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光辉典范，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在实践中开创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面政权的正确道路。

临时中央政府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1931年11月7日，是江西这块红土地永远值得骄傲、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自中共中央迁八七会议以来，至1930年初，除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相继创建井冈山、赣西南和闽西红色区域外，全国还有多块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创建的湘赣边和湘鄂赣边红色区域，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创建的赣东北红色区域，彭湃、古大存等领导创建的广东东江红色区域，杨善集、王文明等领导创建的琼崖红色区域，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创建的湘鄂边和湘鄂西红色区域，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创建的鄂豫皖边红色区域，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创建的广西左右江红色区域。这些红色区域遍布赣、闽、湘、鄂、粤、皖、桂各省，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但是，这些红色区域由于区域分散，互相不通信息，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联系极不方便，客观上增添了中共中央对全国各红色区域工作指导上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全国各苏区斗争的领导，同时还要求全国各苏区之间互通信息，加强联络，以便在斗争中更好地互相配合。于是，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20日决定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共商大计。

正当“一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紧锣密鼓着手筹备之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致使会议被迫4次延期，最终确定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就在14年前的这一天，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开会的日期确定了，但即将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呢？共产国际执委会首先想到朱毛红军活动的赤色区域。他们认为，只有到赤色区域去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才最安全可靠，也最便于就近领导苏维埃区域的工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明智的决定。它不是简单的开会地点的变更，表

动态跟踪管理,突出从严要求,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用要克服急用现找、降格以求等问题，关键还是要从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健全常态化发现使用机制，确保年轻干部真正被选出来、用起来。通过建立蹲点调研工作机制，结合年度考核、一线考核等工作，采取一对一访谈、实地查访印证等方式，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广泛发现和掌握一批“好苗子”，并及时使用起来。

动态跟踪管理,突出从严要求,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年轻干部选拔出来了，就要培育好、管理好，越是重点选拔的越要重点管理，越是有培养潜力的越要严格要求。年轻干部处于事业起步期，社会阅历较浅、党性历练相对不足，必须坚持把从严要求贯穿管理监督的全过程各方面，帮助年轻干部走好成长的每一步。

加强日常管理。年轻干部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更不能任其自然生长，要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施肥浇水、修枝剪叶、驱虫防病。综合运用培训、考核、谈

明：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革命胜利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胜利上面，只有毛泽东主张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维埃区域，都没有派代表出席上述准备委员会。两个月来围绕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不知道。可是，历史的责任已悄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31年11月7日清晨，叶坪红军阅兵广场人声鼎沸，口令阵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隆重举行阅兵典礼，庆祝“一苏大会”召开。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条例等法令草案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草案，并决定临时中央政府驻在瑞金，并改为“瑞京”。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在江西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安源煤矿位于江西萍乡境内，它和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矿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1921年秋，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到安源煤矿考察。他利用同乡的关系住在安源煤矿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里，以参观矿山的名义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疾苦和路矿情况，启发工人的阶段觉悟。经过一周时间的考察，认为安源是一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好地方。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和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商定，请黄爱设法与安源工人建立通信联系。之后，株萍铁路局的火车司机朱少连利用跑车常到长沙的机会，将《劳工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带到安源，使全国各地劳工运动的消息在安源工人中不断传播开来。

同年11月，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宋友生再次来到安源，同工人进行交谈，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宣传组织工人团体的必要性，并决定派李立三常驻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到安源后，在工人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吸收8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于同年年底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随后，李立三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把教授文化知识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过程中，李立三吸收朱少连、李涤生等6名工人骨干为共产党员，于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隶属中共湖南支部，李立三任书记。

中共安源支部成立后，随着路矿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党员人数增加很快。1923年春，在支部基础上成立中共安源地委，到1924年10月，党员增加至108人，并在路矿消费合作社、俱乐部机关等处成立党小组。1925年1月后，小组改称支部，党员已有230人。

中共安源支部是在江西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安源路矿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同江西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此，安源路矿工人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者系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彼时正在军中、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领导协调抗日大局

1937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主任，负责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七七事变翌日，朱德等人即联名致电北平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指出：“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他抓紧部署红军出师抗日准备，写下《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进行号召动员。8月，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并提出多项具体建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朱德任总指挥，率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彭德怀身兼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等职务。7月5日，他还在西安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红军改编问题，8日晚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通过广播知悉事变，连夜部署红军调查渡河点，预备随时出动抗日。他要求战士们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练武项目，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痛击日寇。八路军成立后，他担任副总指挥，不断带来华北战场上振奋人心的捷报。11月，彭德怀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和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西安事变之后就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协商抗日救国的办法，并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整理后报告中央。他协调建议中央就时局发表主张见解，组织安排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积极推动全国抗战战略方针，还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在多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及红军代表处、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八路军成立后，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同时领导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等工作，在国共合作抗战中不断发挥着协商沟通的重要作用。

改编部队投身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贺龙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正在积极准备改编部队。他拥护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对开赴抗日前线充满热情。“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但他也保持着对蒋介石的警惕性，指出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八路军成立后，贺龙任第二二〇师师长率部奔赴山西前线。依托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力量，第二二〇师有力抗击日寇，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黄土高原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热血沸腾，情绪难平。在前方战局瞬息万变的日子，他心急如焚等待着国共两党谈判结果，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云阳一带积极组织部队练兵，随时准备开拔抗日。8月22日，红一军团作为红军先遣队向山西进发，聂荣臻完成出师部署后马不停蹄赶往洛川，在洛川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应当关注军队出动与战略、游击支队、外交、财政等方面问题，这些考量也成为他日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基础。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共同指挥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平型关大捷之后，他受命留守五台山地区，领导诞生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编为八路军

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共和国元帅

□ 董俊林 王一戎

后，他担任第一一五师训政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前后，为确保战士们接受部队身份的重大转变，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来统一认识。罗荣桓组织编发了讲话提纲，派干部下部队搜集思想反映，亲自深入红四师第十团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内他几乎跑遍每个连队，和官兵像唠家常一样，深入浅出分析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不断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革命的目的，反复说明大敌当前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全力做好抗日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转换任务抗日为要

刘伯承当时担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务，并担任了援西军司令员，主要任务是援助西路军。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正在处理西路军的问题，收容援西军失散人员。7月22日，刘伯承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持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二九师师长率部出征，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从西路军返回延安的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参与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以及洛川会议等，迅速投身到民族大业中去。他出任第二九师副师长，与师长刘伯承一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一系列对日作战。

七七事变时，陈毅还在南方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国民党停止“清剿”后，陈毅从别人送来的书刊中找到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这是他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来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策和形势出发，他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战略眼光和家国情怀。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要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不宜全部集中抗日，陈毅坚决反对，他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改编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队长，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